



## 城市书房为何蹿红

■ 符湘林 城市书房作为图书馆分馆建设的一种样式,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在长三角不少地方,城市书房里常常座无虚席,有效带动了市民纸质阅读量的上升。

城市书房是公共图书馆的延伸服务阵地,实现无人值守和读者自我管理服务,通常依托实体书店、茶楼、酒店、民宿等开设。它之所以蹿红,与以下几个因素紧密相关:

一是空间感、设计感强,环境优美。如采用“城市书房+书店”“城市书房+文化礼堂”“城市书房+酒店”“城市书房+咖啡店”等方式,引领阅读空间的提档升级;把社区文化中心改造造成融书房,请设计大师操刀,建成后迅速成为网红。

二是就近便利,方便借阅。一些地方把城市书房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基础设施。在选址上,多为贴近群众生活的核心区、休闲的核心地、公共服务的重点区,或者依托原有的社区书屋、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等及人流量大的茶楼、酒店、民宿、旅游景区等予以改造建设。有些城市书房还直接建在小区里,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参与。

三是大量采用人脸识别、无线射频等新技术,无人值守,24小时不打烊等特性,降低了参与门槛,受到上班族的欢迎。

四是融合发展,跨界服务。例如,一些地方的城市书房里不仅有书,而且有文创、有活动,大大增强了吸引力。

蹿红的背后,有四个“离不开”:一是文化投入和政府重视;二是社会参与,包括社会各界出场地,出空间、出设备、出资源、出服务等;三是标准化建设与管理;四是后续运营与活动,如一些城市书房通过大数据分析,实行精准购书、精准配书并强化消防、人防措施,铸就城市书房安全防护网。

如同中国的电子支付、无人驾驶、新经济消费等走在世界前列一样,大量运用新技术的城市书房也走在了潮流前沿。对美国、欧洲等地城市书房的调研显示,这些地方的各类书房尚未大规模应用人脸识别功能,实行24小时全天开放的也不多。我们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公共文化服务经验,但也要正视和发扬自己的优势、特长。随着社会各界的进一步重视,借助城市书房为广大市民提供更为优质、均衡的公共文化和阅读服务,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老百姓的需求在不断变化,只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满足群众需求。在城市书房的未来发展中,有些问题不应回避:

第一,怎样加强长效运营保障,建立统一标准?随着城市书房建成开放,相应的保障经费和人手需要大量增加,原有财政资金是否有专门的支出项目予以保障?另外,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是否需要建立各城市书房之间的统一标准,便于今后数据打通、服务共享?

第二,怎样提供均等化服务?商场、楼宇等是城市书房建设的主要载体,年轻人、学生是城市书房的主要用户。那么,在那些不那么热闹、人气不那么足,但需求仍然存在的地方,包括农村,如何规划建设城市书房(名称可能叫乡村书房)?如何平衡好“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关系?

第三,怎样推动新技术、新场景更广泛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精准实现需求捕捉和服务推送,城市书房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新技术?另外,共享办公空间日益流行,城市书房如何推进与这些新空间的融合发展?

第四,怎样更好地发挥主阵地作用?城市书房是便捷的新兴阅读空间,但一些特色咖啡馆、特色餐厅也提供类似服务或功能,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打造新兴公共文化主阵地?

(作者为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 构筑综合性海洋管理制度

■ 金永明 在海洋科技及装备的发展以及各国依赖海洋资源程度加深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目的是促进海上互联互通与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这是针对海洋本质、消除海洋争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新时代,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深化认识海洋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构筑综合性海洋管理制度。其中,尤为需要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以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但不应该拒绝遵守基础原则。一些国家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具有举证责任,所提的方案也需具有建设性,所提的建议应具有合理性、可接受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是全体人类。这里的人类,既包括今世的人类,也包括后世的人类。由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海洋是公共产品,是人类共同的财产,需要遵循代际公平原则这一本质性要求。

客观上,海洋命运共同体规范的是整体行为,包括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空间和资源的一切活动,体现了有效合理使用海洋空间和资源性的整体性要求。这是由海洋的本质属性(如关联性、流动性、承载力、净化性等)所决定的,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在运作方式上,应坚持共同、共建、共享的原则,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采取多维合作的方式,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管理、共同获益、共同进步的目标。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战略研究室主任)

# 打造长三角自主品牌新高地

■ 王新新 谢锐

5月10日是“中国品牌日”。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城市群必须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政策先行优势,以合力打造世界级自主品牌新高地为目标,着力破解区域壁垒、体制机制障碍,助力长三角城市群全面提升国际国内要素配置能力和效率,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全球合作竞争。

## 缺乏全产业链支撑

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仅有阿里巴巴(85位)、恒力集团(436位)两个品牌上榜。相较于世界其他城市群,缺乏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是制约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短板,折射出其在全球城市群网络体系中的联系能级和辐射力偏弱以及主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不足。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同构化和主导产业同质化竞争,难以支撑自主品牌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提升,尽管长三角区域产业发展水平持续领跑全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产业规划布局和产业协作机制,主导产业同构化使得城市群产业分工梯度和层次不够明晰,自主品牌产业技术密集度偏低,关键核心技术缺乏。囿于产业发展关键性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长三角城市群在技术、品牌等关键指标上,始终未能在国际同行业建立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和品牌产品。

长三角城市群特色产业链存在断裂现象,难以以为重塑自主消费品牌竞争优势提供产业链支撑。长期受益于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产业基础、轻工制造业及消费品牌,是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最具特色的产业集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and 大规模产业转移、中外合资合作,一批老品牌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出现断层,不少自主消费品牌在研发设计和商务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发展基础仍显薄弱,新一轮升级发展较难获得全产业链支撑。

长三角首位城市的全球城市生产性服务能级不足,难以支撑自主品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首位城市,“上海服务”的对外联系能级和网络辐

射范围与长三角相对完整的产业品牌链、企业生态链尚不完全适应、匹配。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原创性研发设计、总装集成创新、投融资金融服务、工业互联网、品牌战略管理、法律和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战略性环节,还存在有效供给能力和创新水平偏低、市场对外开放度不高、区域带动性与国际竞争力不强、基础性经济金融体制要素与国际通行准则的兼容性不够等问题。

## 培育强势产业集群品牌

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需要孕育出一批“立得住、打得响、传得远”的世界级自主品牌和跨国企业,构建具有辐射带动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品牌经济体系,助力“中国品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

第一,强化长三角城市群自主品牌发展体系的有效衔接与优势互补,形成“1+1+1>4”的品牌经济高质量发展合力。

上海要充分发挥在国际消费城市建设、国际金融要素集聚、国际创意设计人才荟萃、国际会展业集的综合型和开放性服务功能优势;浙江、江苏和安徽要发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民营经济发达活跃、实体经济实力雄厚、产业技术创新、内陆腹地广阔等比较优势,进一步对接与整合“上海品牌”“浙江制造”“江苏精品”“安徽名牌”等自主品牌发展政策和体系。

可立足各自产业优势,现代产业分工要求及区域优势互补原则,找准结合点和发力点,共同培育若干强势产业集群品牌;可积极通过多元投资、兼并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释放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发展战略空间,以重点园区和企业为发展主体,以产业资本合作为发展纽带,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原动力,以服务平台建设为发展通道,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发展保障,着力提升长三角城市群自主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与对外辐射力。

第二,强化长三角城市群自主品牌以资本为纽带的产业链深度合作,以制度创新破除品牌升级发展的市场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

要鼓励上海自主品牌,特别是尚未激活的老品牌与长三角地区具有制造业传统优势的龙头企业、具有国际市场优势的平台企业,开展以资本为纽带的战略合作,形成长三角

产业链再造和品牌价值链互塑的新优势。

以重大产业项目跨省市协作示范项目为突破口,率先探索区域产业一体化制度创新及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率先破解系统性顶层设计、政绩考核评价机制、财税分享机制、产值统计制度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和行政壁垒,促进各类创新要素跨区域开放共享和自由有序流动,为推进长三角自主品牌转型升级、引领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强化以“智能+文化”驱动品牌创新,率先培育一批具有引领性的自主品牌。

一方面,以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引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长三角城市群也涌现出一批以科沃斯机器人、荣威智能网联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自主品牌。要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在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率先培育一批高科技含量并引领新生活方式的新时代自主品牌。

另一方面,支持企业实施“品牌+文化”战略,鼓励自主品牌加快文化建构与拓展。可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注入互联网新媒体营销思维,讲好长三角品牌故事,加强与全球用户开展品牌文化互动交流,进一步提升自主品牌的知名度、文化内涵丰富度和文化附加值。

第四,强化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夯实“上海服务”助力长三角城市群自主品牌国际化的桥头堡功能。

完善多层次、一体化的品牌金融生态系统。精巧借助科创板带来的机遇,集聚和吸纳国内外新金融要素或金融创新业务,深入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品牌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构建面向全球品牌企业的国际投融资平台和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借助商标转让、股权转让、战略投资、品牌融资等多种形式,从更高层次提升资源要素的匹配质量和配置效率,为孕育壮大新兴品牌与传承振兴老品牌提供原动力。

提升品牌服务专业化、国际化水平,做强、做大、做优世界级品牌专业服务市场,对标品牌价值评估国际标准,建立资产评估、担保、融资、租赁等品牌专业服务的“长三角标准”,形成市场化的品牌价值发现和交易机制,推动上海成为国际品牌定价中心。

搭建长三角商标海外维权保护的功能平台,为自主品牌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培训、国际商标注册便利化、海外维权信息查询、国际市场维权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 牢牢把握人民主体性政治立场



思想  
茶座

■ 杨起予

##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述,将人民主体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人民主体性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

## 既是信念 也是责任

作为中国道路的实践内容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人民主体性思想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指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于每一个共产党人来说,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这既是信念,也是责任。

新时代,强调人民主体性就是要将人民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方略的根本依据。由此,就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国人民,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推动共同富裕。

需要看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更为侧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大论述重心是使改革发展成果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对人民主体性的丰富化和具体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毛泽东同志以“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清晰地说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的人民性。实践中,由人民性还派生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此为根本,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走向胜利和成功。

作为这个过程延伸与深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这一过程同样是以人民主体性为主旨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将“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根本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阐述了发展的本位是人而非物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敦促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强调“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这些重要讲话进一步夯实了中国道路所内含的人民本位属性。

人民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中,而且体现在理论创新中。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被称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论断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目标和最终目的概括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大原则。社会主义本质论针对的是姓“资”姓“社”问题。作为这一理论的延伸,“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应运而生,即将社会主义判断标准定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较于之前的论述,这里更多地论述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

不过,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综合国力的提升,都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都要落到发展成果为大多数人共享上。这一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将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内在地在合为一体,使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人民主体性进一步显现。

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体现了人民主体性这一核心理念。面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对党的建设为逻辑起点,着重关注党的代表性和社会基础的变化。就理论层面而言,政党是个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离开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将会逐渐流失。就现实层面而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育、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经济多元化与文化价值整合等结构性矛盾的解决,也需要依靠人民立场的观念在实践中的贯彻才得以实现。

进入新世纪,与巨大成就接踵而来的是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收入分化、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矛盾和问题。在此大背景下,科学发展观更多体现出一种伦理价值。它不仅把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连为一体,而且使改革开放真正成为了一种可持续的过程。以此为引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 最高位置 最重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经济领域的新常态到政治领域的弘扬,无不体现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卓著成效。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阶段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历史阶段,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之前的表述相比,今天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和重心已



学界观察

■ 万勇

对于文化遗产,有些人认为遗产保护只花钱,没有经济价值;有些人则只看到精神文化价值,而有意淡漠经济价值,觉得一旦跟钱有关系,就会显得目光短浅、俗不可耐。在区域规划与发展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重技术、重空间、重工程和轻文化、轻历史、轻系统的倾向。

殊不知,历史文化是有大价值的,不仅是精神价值,也不仅是弘扬正能量、体现软实力,而且会带来实实在在的长远效益。对于城市人文遗产而言,今天可能是民生问题,明天可能是文化问题,后天可能是经济问题,其价值往往会相互转化。一旦决策失误,可能导致出现长时间跨度的大难题,这就把文化遗产保护推上了更广阔的公共视野,也对具体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激活存量空间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人类文明的共同体现。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以及21世纪会安草案、新城市议程等国际公约或会议建议,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大全球共识和普遍原则。

文化遗产作为存量空间,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海中心城区,增量空间越来越少,存量空间的利用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这些存量空间,主要由众多文物单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乡村聚落所构成,其合理保护与利用将起到促进城市更新、城市修补、产业转型和文化复兴的作用,连带效应也很强。

文化遗产具有正能量,不是负资产。文化遗产具有稀缺性甚至唯一性,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和灵魂,是世世代代建设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累积起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真实反映。文化遗产的正能量价值,很难用金钱去估量。相反,文化遗产一旦湮没,不仅对不起祖先与子孙、对不起历史和人民,也是多花钱都买不回来的。不管多么精致的假古董都替代不了,各种文字、语言等记忆手段也是难以企及的。

文化遗产具有城市认知意义、宣传教育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精神财富和社会价值。保护好文化遗产,守住城市的记忆,告诉人们我们从哪里来,是对历史的责任。因此,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实际上也是“算大账”和“算小账”的问题。

文化遗产对区域经济具有正向作用。一般的现代建筑随着时间推移而在价值上会有所减损,文化遗产则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醇厚、珍贵。文化遗产一旦得到很好保护,可以为未来发展保护本源、累计资源、蓄积能量,是积极的经济资源,而不是拖发展后腿的障碍。

文化遗产的精心保护、合理利用,不仅保护本体建设的物质空间,还可实现对于建筑本体和周边地区的产业振兴、经济复兴,起到激活存量空间、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空间等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实现人口疏解、改善原住民居住环境、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 引导产生聚合效益

从价值角度来看,事物的价值往往包括似乎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如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也可称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自身价值和附加价值、短期价值和长期价值、硬实力和软实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也可称为显性价值和隐形价值)、“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文化效应”,等等。

看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综合起来看,多维多视角地看,而不能偏废。既要直接价值、物质价值、自身价值、短期价值、硬实力、有形资产、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更要看文化遗产所蕴藏的价值、精神价值、附加价值、长期价值、软实力、无形资产、社会效应和文化效益。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低估和偏废。

文化遗产行政管理部门的最大工作、最大责任、最大压力,是把文化遗产的间接、潜在、隐性、无形、精神、长期的价值表达出来,继而与综合经济部门、规划建设部门一起推进有利于文化遗产综合价值最大化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价值评估标准。这一价值评估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定量标准,二是定性标准。有些情况下,文化遗产体量虽小,能量却巨大。例如,中共“一大”会址,几间里弄,却产生了那么大的历史、人文和思想影响,是难以用定量的经济价值指标来衡量的。

针对具体项目,定量标准比较容易,而定性标准往往被忽视,也不易被确定。建议由文化遗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定性标准的指导思想 and 决策程序,确定相应权重,甚至建立一票否决制,以平衡过于注重经济技术指标的消极影响。

对上而言,历史上曾经长期保持世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多界共存局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群落,建筑聚落。如果在空间上因势利导,引导亚文化产生聚合效益,争辉斗艳,将进一步丰富城市人文生态的多元化、多样性。这是上海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特点和亮点。

具体来看,要立足于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地带,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海上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更加注重成片、成街坊历史风貌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保护。特别是,老城厢地区中式古典建筑、外滩西式大楼、静安寺湾弄风情、徐汇市花园风貌、虹口闸北市民住宅等,各自形成区域特色,可以因势利导,将记忆碎片串联起来,将建筑单体统筹起来,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 注重城市人文遗产整体性保护